

脫新範

細說圖書事業的緣與愛

脫新範女士，是本港的一位穆斯林，也是香港中文大學1972級社會學系畢業生。她出生於一個極為平凡的基層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與奮鬥，實現了報效社會、回饋香港的理想。在她長達數十年的公務生涯中，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工作，是最令其難以忘懷的。作為中央圖書館開館館長，她將自己人生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大眾閱讀與圖書事業。她的故事，是一種感動，也是一份激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為資料圖片



■香港中央圖書館



■脫新範於北京首都圖書館作報告



■脫新範主持國際專業研討會



■脫新範與中文大學學生分享工作心得



■脫新範在寧夏大學座談

長期的公務員生涯，練就了脫新範女士嚴謹的行事作風。即使是面對記者的採訪，她也會對每一個問題仔細思考，然後作答。既有學生的細緻，也有長者的慈祥，令人難以忘卻。

讀書時靠補習賺零花錢

脫新範回憶說，小的時候，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並不是很突出。因為出身於基層家庭，活動範圍有限，大家更多是為生活中的瑣碎之事而忙碌。但是，上中學以後，自己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大，尤其是參加朋友們組織的聚餐等活動，便會意識到自己的族群屬性。但是，朋友們沒有絲毫的歧視，都是以理解和包容的態度來看待穆斯林與其他人士生活習慣的不同。脫新範認為，這從某種意義上，也證明了香港社會高度的包容性與多元性。

她覺得，自己的成長歷程，從一個側面見證了香港社會的變遷與進步。她回憶到，當年她上小學和中學時，是1960年代的末期，那時，能夠進入大學的名額分配非常少。經濟起飛狀態中的香港，社會競爭與人才競爭非常激烈。為何兒時的功課特別好，以至能夠入讀到一流的香港中文大學，這是記者特別關心的問題。她說，自己的成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學時代老師的教誨與幫助。在讀書時，父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打工仔，而母親則根本沒有工作。無論是生活還是課業，青少年時代的脫新範都面臨着很大的挑戰。基層家庭的出身，讓她很早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擔；而老師與朋友們的鼓勵、支持，則伴隨她走過了一次次人生的轉折點。中學四年級時，就已經靠自己參加的補習

習工作來掙取生活來源。因此，以優異的成績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其實並不出奇。這也是刻苦努力的結果。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後，體會了社會生活不易和艱辛的脫女士，更加自立、自強。為了減輕家中的負擔，也為了能夠讓自己盡快地融入到社會大時代的生活中去，她依舊採用中學時期勤工儉學的方式，前往夜間學校去教課，以便在獲得勞動報酬的同時，加深對社會的了解與熟識。

情繫圖書事業

大學畢業後，脫女士幸運地考取了公務員，從事政府的文化推廣工作。從基層做起的她，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力求讓自己的工作為市民所滿意。每當政府舉行大型的文化活動，需要講解、司儀或是公關時，大多會要求能力強的脫女士擔綱重任。她進入公務系統的年代，正是香港逐漸擺脫「文化沙漠」污名，進入大發展、大繁榮時期的起步階段。在各區圖書分館工作的日子裡，讓她能夠系統化地對香港的圖書管理與開發事業進行通盤和長遠的思考。

香港回歸前後，脫新範女士受命進行有關香港中央圖書館的籌組工作。這是一項極為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中央圖書館從籌組、到開館再到一點點壯大，都是她人生回憶的寶貴精華。不經意間歲月流逝。當年和同事們一起外出考察、學習管理經驗、購置設備的經歷，讓她覺得自己的人生步入了一個新的台階。雖然艱辛，但卻非常充實。

2001年，中央圖書館終於順利開館。作為創館館長

的她，認為這為香港公共圖書服務事業開創了新的一頁。在她看來，香港的公共圖書事業，幾十年來能夠不斷發展，實則是幾代香港人不懈努力的結果。中央圖書館落成時，他們面對的是一系列繁重而嚴密的籌劃工作。內部的裝修，館藏的整合，電腦系統的應用，多媒體的檢驗與測試，數據庫的綜合管理，人員的調配，甚至清潔保安，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她和同事們任勞任怨、攜手並肩地開拓和創造。那是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歲月。大家緊守崗位，上下一心，目標一致，將來自社會各界的期待，轉化為工作的動力。每當回想起為着建立香港中央圖書館那既辛酸、又溫馨的日子，那種夜以繼日、朝九晚九、廢寢忘食的工作狀態，是她與同事們共同努力、共同奉獻的心力體驗。

「開拓資訊空間，邁進自學紀元」，是中央圖書館的創館理念。中央圖書館成立初期，香港正處於經濟變遷的年代。培植市民的自學能力，作為普羅大眾能夠賴以維生的基礎。長期以來，在脫女士等幾代中央圖書館職員們的奮鬥下，這裡已經成為了「立學術典範、樹教育楷模」的地方。中央圖書館，已然成為市民心目中一個資訊與文化的薈萃之地。為了表彰脫女士為中央

圖書館發展作出的貢獻，2004年國慶節前夕，特區政府正式向她頒發了榮譽勳章。

勉勵當代年輕人

脫女士介紹，目前全港的穆斯林約有二十四萬，其中華人穆斯林約有三萬人左右。與早期穆斯林社群與香港社會的關係構相比，現當代的本港穆斯林已經較好地融入了本土社會。穆斯林中，有終審法院的大法官，有大學教授，各行各業的精英都有穆斯林的身影。這是穆斯林社群自強不息的努力，也是香港社會多元、開放與包容的最好關注。

退休後的脫女士，除了自己進行經常性的社區活動外，也關心着香港的未來一代青年人。她時常參與各種講座和獎學金資助的活動，來為年輕人的發展提供幫助。她坦言，目前，隨着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相對飽和的階段，社會資源的人力上升空間不足，因此，

年輕人普遍有無法上位的感覺。大學生，較之於以往，也不再是天之驕子。因此，年輕人需要對自己的發展進行綜合性的長遠規劃，也需要在時代的拚搏中，有不斷進取的精神。

■脫新範在寧夏大學。



離與恨——晚清知識分子的無奈抉擇

文：徐全

晚清中國，並非沒有改革的希望。其實，面對海內外一陣陣要求變革的浪潮，清廷也作出了相應的回應——例如，實行新政，廢除科舉，預備立憲等等。然而，這些措施並沒有挽救清朝的命運，尤其是預備立憲之舉，弄巧成拙，直接造成了清廷的垮台。可謂「假改革引來真革命」。

在風起雲湧的局勢中，知識分子也開始面臨着自身的抉擇。這是清廷政策的使然，也是時代要求知識分子必須作出一個交代與說明。「國破山河在」的歲月中，文人心中固然充滿悲苦，然而，若朝廷能夠對文人的感情有所反應——哪怕這種反應是表面的，也不至於將來的事態擴展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局面中。

經歷了「庚子國變」，深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維影響的知識分子，逐漸產生了一種共鳴——無論是以科舉功名出身的舊式文人，還是以西學留洋背景為利器的新派學子，都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國家必須改變。這種「改變」，

要建立在「近迫日本遠歐美」的現實國族生存中，也必須是一種新型國家體系構建的想像與努力。因此，改革，實際上已經成為一般知識分子的共識。另一個較為緊迫的原因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已然一次又一次發動武裝起義，誓將清朝皇帝拉下馬。與主張漸進改革的保皇黨人相比，革命黨則全無「忠君、報國」的包袱，他們毫不諱言——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君主帝王的共和國。既然清廷的主體是滿洲親貴，那麼，排滿——這一在後世看來頗有些實用色彩的政治主張，也就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登堂入室，大行其道。被魯迅譽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甚至曾寫下《客帝》一文，以漢族本位的立場，對力主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光緒皇帝大加抨擊。這一切，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改革派眼中，簡直是大逆不道、不可理喻。

照理說，有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清廷應當銳意改革，不斷進取。但是，現實的發展卻令這些

對清廷仍舊寄以一絲希望的書生們大為失望。究其根本，便是清廷在改革過程中，將成果盡數予滿洲親貴所享有，引起知識分子、尤其是地方士紳階層的強烈不滿。在預備立憲與鐵路國有兩件事中，更是凸顯了這樣的矛盾。其實，在一般知識分子看來——尤其是在辜鴻銘、張之洞這樣的大人物眼中，清廷的滿洲親貴，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當時的中國，滿洲人與漢人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分別。伴隨着新式陸軍的建立，更是不存在象徵滿洲軍事實力的八旗軍。更為重要的是，對於向來看重道統的中原文人而言，只要奉行儒家禮教，便可據天下之位。正是此種思想，才使得康熙年間，吳三桂那種以漢族民族主義動員方式進行的叛亂，未能得到漢人儒生的支持。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清廷卻不識時務，依舊以保持滿洲親貴的權力和既得利益為首要目標。親貴集團，已成為一種利益共同體。因此，在預備立憲之後，清廷雖然表面上實行了責任內閣制，但內閣

成員多為皇親貴胄——被坊間戲稱為「皇族內閣」，地方文人尤其是立憲派大失所望。與秋瑾齊名的徐錫麟，就是從立憲派轉化為革命黨的。緊接着，「鐵路國有」政策，剝奪了各省地方商人的利益。因為鐵路係地方商人高投入投資建造，可清廷收購價偏低，導致群起而反對。古語云：「國不與民爭利」，但當局以改革為名，行掠奪之實。批判、指責之聲四起，從地方的各省議政局蔓延到北京的中央資政院。最終在「保路運動」的風潮下，造成湖北兵力空虛，釀成了武昌起義。

現今來看，選擇失望、憤恨與離去的，又豈是伍廷芳一人呢？清廷為保有既得私利，置知識分子的拳拳報國之心於不顧，將他們推向了反面。在史學界，有學者倡言「告別革命」之說，認為若無辛亥之舉事，國家可漸進轉型。然而，這一構想的前提是：清廷願意改革，而且是真改革。那麼，歷史的脈絡，已經對這一假設，給出了無情的答案。